

清史通鉴

从金戈铁马的努尔哈赤到黯然退位的末帝溥仪，全书以生动鲜活的笔法，精雕细琢出爱新觉罗氏的十二位帝王，音容笑貌毕呈毕现，品性情趣栩栩如生。同时，依托于大量史实资料，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清代二百多年的兴衰史；创业的艰辛令人肃然起敬；辉煌的鼎盛让人振奋不已；衰落的末日，让人捶胸痛泣，全书既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，又具备翔实的史学价值。



主编 启智

第三卷

清史通鉴

从金戈铁马的努尔哈赤到黯然退位的末帝溥仪，全书以生动鲜活的笔法，精雕细琢出爱新觉罗氏的十二位帝王，音容笑貌毕呈毕现，品性情趣栩栩如生。同时，依托于大量史实资料，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清代二百多年的兴衰史；创业的艰辛令人肃然起敬；辉煌的鼎盛让人振奋不已；衰落的末日，让人捶胸痛泣，全书既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，又具备翔实的史学价值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庸弱守成

清仁宗——嘉庆





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
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十月初六日凌晨丑时，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出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，他被取名为爱新觉罗·颙琰，这就是后来受禅嗣位、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。

颙琰的出世，对于乾隆皇帝弘历的家庭生活来说，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庆事。说它不大，主要是颙琰既非乾隆的长子、独子，也不是嫡子，所以算不上是什么头等的大喜事。说它不小，就是在过去，人们总是希望多子多孙，多福多寿，更何况是封建帝王喜添贵子呢？！早在颙琰诞生的这一年元旦，乾隆就以其抑捺不住的喜悦之情，在御绘的《岁朝图》志语中，写下了“迓新韶嘉庆”之句，颙琰嗣位后之所以改元嘉庆，显然是与这一诗句相应的。再说颙琰的生母魏佳氏，本来是一般的庶妃，她之所以接连地被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她自乾隆二十二年起，为乾隆连生四子，乾隆对此能不高兴吗？颙琰正是在这不大不小的喜庆气氛中降临人世的。

颙琰在乾隆诸子中，排行第十五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。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，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，确是人们始料不及的。

首先是行次问题，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。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，而颙琰却排在第十五位。这个行次，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，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，凭这一行次要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，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。当然，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，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，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，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、清世祖福临、清圣祖玄烨、清世宗胤禛、清高宗弘历的继位，都不是由于居长、居嫡所致。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，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，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。

清代前期帝位继承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、复杂的。其中有实力派的问题，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，倾倒其兄代善、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；有两强相争，第三者得利的，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，在皇太极死后，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，才得以被拥戴为帝；有直接参与争夺的，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继位；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，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，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、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。但应该看到，汉族王朝那种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建储制度，对清王朝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，象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时，豪格继位的呼声本来很高，这不仅是由于他立下诸皇子无与伦比的赫赫战功，更重要的是他是皇长子，在“无嫡立长”的情况下，自然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，只是由于他的强劲竞争对手、年龄比



他还小三岁的叔叔多尔衮从中作梗，为了避免公开分裂和内战，最后双方都作了必要的退让，选立了年幼的九弟福临。不过这种弃长立幼的做法，在当时已遭到非议。朝鲜使臣李衿从沈阳发回的密报说：“清汗（指皇太极）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，九王（指多尔衮）废长子虎口王（指豪格）而立其第三子（指福临），年甫六岁，群情颇不悦。”正说明了无嫡立长的嗣位法，对清王室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了。

又如清圣祖玄烨的首次建储就很典型，他不仅打破了清朝皇帝生前不预立皇太子的惯例，而且公开确认了立嫡立长的建储原则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，当玄烨还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，便急不及待地正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，并且颁诏天下。

允礽是孝敬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，他虽是皇二子，但由于其亲兄承祜四岁夭亡，不叙齿，故允礽实际上是嫡长子。故允礽之被册立，标志着嫡长继承制已为清王室所确认。其后，由于康熙诸子对储位的争夺异常激烈，允礽本人也日渐骄纵，玄烨遂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九月，以“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训，肆恶虐众，暴戾淫乱……不孝不仁”等罪名，第一次把皇太子允礽废掉。但过了不久，玄烨对这一处理便有所后悔，同时也是为了遏止诸子争夺储位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和激化，再一次宣告立嫡的原则，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。由于允礽此人实在不争气，在复立后仍不知悔改，继续胡作非为，不断扩大“太子党”的势力。这样，迫使玄烨不得不在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十月，再度将允礽废掉，把他禁锢于咸安宫。而皇四子胤禛却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储位斗争中，成了最后的胜利者。允礽尽管最终未能承继帝业，但立嫡立长制的被确认，却是十分重要的。

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胤禔的处境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，但说来也怪，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，其中大部分是“天命不济”，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的夭折，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、六岁；小的仅有几个月。这种情况对于胤禔是“祸”是“福”，关系甚大。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，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。

乾隆嫡子有二。其一是皇次子、嫡长子永璉，生于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六月，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、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。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，性尚恭俭，“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，不御珠翠。岁时以鹿羔氍毹为荷包进上，仿先世关外遗制，示不忘本。”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，再加上喜得嫡子，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，除乾隆生母、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外，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。早在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七月，弘历便遵用乃父雍正所创的密建家法，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永璉内定为皇储，亲书其名，密置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后。只是由于永璉没有福气，只活了九岁，在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十月病死了。乾隆为此发布上谕说：

“永璉乃皇后所生，朕之嫡子，聪明贵重，气宇不凡。皇考命名，隐示承宗器之意。朕御极后，恪守成式，亲书密旨，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‘正大光明’榜后，是虽未册立，已命为皇太子矣。今既薨逝，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。”

这一上谕，一方面反映了乾隆立嫡观念十分强烈，同时由于永璉的逝去，使他不得不把第一次内定的皇储公开，正式册赠为皇太子，赐谥“端慧”。所以永璉又





被称为端慧太子。

乾隆的第二个嫡子，是皇七子永琮，生于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四月，也就是颙琰乃兄之后十七年出世。这样的嫡子实在难得，乾隆也的确为此高兴过一阵子，看来传嫡又有了希望，“高宗属意焉”。“拟书名臧贮，继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。”但老天爷好象是有意捉弄这位立嫡心切的乾隆帝，永琮的命运比他的亲哥哥永璘还糟，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，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十二月因出痘去世。命丧仪比一般皇子从优，谥“悼敏”。乾隆在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既含混又真切的话：“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，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，邀先人不能获之福，此乃朕过耶？！”此话看似发问，实是回答，看来只好半是怨天，半是责己了。当时，颙琰虽然尚未出世，永琮的早殇好象与他毫不相干，然而从乾隆决心立嫡这一点看，其关系可大了。所以在事隔五十二年之后，颙琰作为实现了亲政的嘉庆帝，心里不由得不想起这位享年仅两岁、而他又从未见过面的七阿哥，并在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三月追封他为“哲亲王”。这或许是出于某种“感恩”吧。

两位嫡子的早逝，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皇后富察氏去世，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。

在孝贤皇后去世后，乾隆曾另立皇后。此人名纳喇氏，原是侧室福晋，乾隆二年封嫔妃，十年十一月进贵妃。为了填补中宫的空缺，在十四年四月先晋封皇贵妃，命统摄六宫事，于十五年（1750年）八月册立为皇后。纳喇氏生有两子，即皇十二子永璘和皇十三子永璟。永璘活得稍长一点，到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去世，年二十五岁。永璟则三岁就夭折了。

立嫡既不可能，立长又如何呢？乾隆的长子永璜，生于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五月，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，她尚未等到乾隆继位，便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去世了。她的封号，是乾隆即位后追封的，先封哲妃，再晋皇贵妃。永璜八岁丧母，这对其在宫中的地位不能不有所影响。在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时，“永璜迎丧，高宗斥其不知礼，切责之。”连永璜的师傅与谕达也因此受到罚俸的处分。仅过了三个月，因廷臣议立皇太子事，乾隆再次“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”，这对于皇长子来说，当然是很不体面的。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，只过了一年多，永璜便病倒了，在病危时，乾隆才封他为定亲王。紧接着，这位皇长子便与世长辞了。

在颙琰出世之前死去的还有三位异母兄长，这就是皇三子永璋和皇九子、皇十子。老九、老十只两三岁便夭折了，未有命名。三阿哥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五月，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。永璋虽说是庶妃所出，然当时在嫡绝长歿的情况下，他叙齿居前，当是有机会嗣位的。可惜他同样天命不济，在颙琰出世前三个月（乾隆二十五年七月）病死，终年仅二十六岁，被追封为循郡王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颙琰的亲哥哥永璐，他生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七月，排行第十四。但他也只活了四岁，在颙琰出生的当年三月病死。

以上八位兄长的早逝，对于颙琰日后的嗣位，无疑是关系甚大。到颙琰出世时，在他前面还有六位异母哥哥，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废后纳喇氏之子永璘外，就是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的皇四子永城、皇八子永璇、皇十一子永理；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的皇五子永琪；以及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的皇六子永瑤。而刚出世的



顥琰，按当时的叙齿虽说“升”到了第七位，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，仍是微乎其微的。事态将如何发展，就得半靠机遇，半靠自我奋斗了。

顥琰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。在封建时代，一般来说是“母凭子贵”，但反过来说，母亲的地位及影响，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，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。远的不用说，清王室的情况就很突出，象世祖福临之得以继位，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才干，或立下过什么赫赫的功绩，而是与他的生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一来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惟一的宠妃，其子福临在嗣位问题上自然占有某些不可言喻的优势，在各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，把他抬出来是符合先帝心愿，使各派势力无话可说；二来在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中，庄妃也善于周旋与笼络，使各实力派相互制约，寻求折衷，最后只好让福临嗣位。圣祖玄烨的生母佟氏，虽不见宠于顺治帝，却受到了顺治生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疼爱，这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佟氏在宫中的地位，而且直接决定着玄烨的前途。

然而顥琰却没有那么好的天份。他的生母魏佳氏，既无特殊的本领，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。她的父亲清泰，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，后家本属汉军，其后才抬入满洲旗。魏佳氏入宫后，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，直到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才封为令嫔，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，显然是低格的。她共育有四子二女，按时间顺序排列是：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皇七女和静固伦公主；二十二年七月生皇十四子永璐（早殇）；二十三年七月生皇九女和恪和硕公主；二十五年十月生皇十五子、本书主人公顥琰；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皇十六子（四岁殇、未命名）；三十一年五月生皇十七子永璘。从这份时间表里可以看出，佟氏所生子女基本上是靠后的，而且间隔较密，说明她在这段时间已获得乾隆一定的宠遇，但直到三十年六月，她才被晋封为皇贵妃，虽说地位正在上升，但也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恩宠，到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正月去世，终年四十九岁，谥“令懿”。至于被册赠为孝仪纯皇后，那是顥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后的事了。

顥琰自幼由庆妃陆氏抚育，但这位养母在宫中的地位也很一般，她本身未生育子女，乾隆初被封为庆嫔，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，三十六年再晋庆贵妃，至于庆恭皇贵妃的封号，则是顥琰亲政后追尊的。因此，这位养母也不可能给顥琰的继承大位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，这是十分清楚的。

顥琰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，从来未有提督师旅、征战四方，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；也从未督官临民、治理政务，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；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，除每年例行的秋猕木兰外，顥琰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。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皇子时代的顥琰，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。

清朝前期的皇帝，在继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：

一是清太宗皇太极，他过的是戎马生涯，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，都在统帅八旗，奋战疆场，他的皇子时代，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，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

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，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。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；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，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，既短促又简单，他们的才干与智慧，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。





三是世宗胤禛，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，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，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，有学习生活、随帝巡视、参预军政决策、督师从征、审理案件等，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。而所有这些活动，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。

第四就是高宗弘历和颙琰了。他们的皇子时代，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。弘历在临政前夕，还算和鄂尔泰一起办理过苗疆事务，而颙琰却连这点实践也不曾有。同时，弘历即位时只有二十五岁，而颙琰嗣位时已经是三十七岁了。这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，虽说是漫长的，但对颙琰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。

清朝皇室有一个好规矩，就是对皇子读书的要求十分严格，从康熙时开始就是这样。皇子长到六岁，就必须入尚书房从师学习。凡入值尚书房的师傅，都是经过皇帝亲自严格挑选的。象乾隆元年正月，弘历即位不久就着手抓诸皇子的学习，挑选了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朱轼、左都御史福敏、侍郎徐元梦、邵基等六人，任皇子师傅。开学之日，还要郑重其事地举行拜师礼，并面谕张廷玉等人说：

皇子年齿虽幼，然陶淑涵养之功，必自幼龄始，卿等可殚心教导之。

倘不率教，卿等不妨过于严厉。从来设教之道，严有益而宽多损，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。

这一交待是必要的。因为向皇子授书，不同寻常，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，对于这些作为臣下的师傅们，若事先不给吃“定心丸”，不赐予“上方剑”，是很难获得良好效果的。与此同时，乾隆还谆谆告诫诸皇子说：“师傅之教，当听受无遗。”这些话，既是上谕，又是宫规，因而实际执行情况还是相当好的。当时入值内廷的赵翼曾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一段纪实：

本朝家法之严，即皇子读书一事，已迥绝千古。余内值时，届早班之期，率以五鼓入，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，惟内府苏拉数人（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）往来。黑暗中沉睡未醒，时复倚柱假寐，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，则皇子进书房也。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，尚不能早起，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。既入书房，作诗文，每日均有课程，未刻毕，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、习国语及骑射等事，薄暮始休。然则文学安得不深？武事安得不娴熟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不擅其妙，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。以之临政，复何事不办……然则我朝谕教之法，岂惟历代所无，即三代以上，亦所不及矣。

这番话，自然是就总的方面说的，事实上无论皇子还是师傅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可能完全不触犯规章，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，乾隆都是严加诘责，并作出相应的惩处。

颙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，并渡过他皇子时代那漫长的书斋生活。后来，他为刊刻自己的《味余书室全集》写了一篇序言，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读书生活，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。该文道：

文以载道，诗以言志。幼而习，长而行，安身立命之处，必应以经书为标准。我朝龙兴辽沈，国语骑射诚为最要根本，固应亿万民敬承勿懈。然为海寓之主，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。故天家子弟，六龄即入上书房



从师受业，陶冶性情，涵濡德义，日亲宿儒，克勤力学，虽才质有不同，聪钝有互异，而化其骄泰之性，使知孝悌之方，悟经书之奥，功非浅鲜矣。视彼前朝太子，偶一出阁讲学片时者，奚啻天壤之分哉。予悟性迟钝，乙酉年（乾隆三十年，1765年）入学，从觉罗奉硕亭（宽）先生读书；至壬辰年（乾隆三十七年，1772年）而五经粗毕，从谢东墅（塘）先生学今体诗；至丙申年（乾隆四十一年，1776年）始，从朱石君（珪）先生学古文并古体诗，直至今日时于几暇，仍相商酌讨论。书窗景况，宛然如昨日也。

这份序言，顓琰既谈到了他读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，也谈到了他从师及习学的简历。他虽然谦称“悟性迟钝”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他的脑子不但不笨，而且相当聪敏，就拿读经来说，六岁入学，十三岁即通五经，这就很不简单了。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，即癸巳年（乾隆三十八年，1773年），就遵用密建家法，把顓琰内定为皇储，又是祀天，又是祭祖，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。可以这样说，顓琰之得以嗣承大位，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、涵濡德义的结果。

当然，顓琰对于自己被内定为皇储，在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但他对于克勤学义的深义，却从师傅朱石君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，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。这一点，还得从“味余书室”的命名谈起，顓琰曾写过一篇《味余书室记》说：

予居禁中，有室五楹，不雕不绘，公余绎昼，所习书史，游艺于诗文，或临法帖一幅，怡然自得其趣也。欲题其楣端请于石君先生。先生曰：勤学者有余，怠者不足，有余可味也，名之曰味余书室。承先生嘉惠之意而为之记曰：夫余之义亦大矣。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盖闻禹惜寸阴，晋陶侃言众人当惜分阴，为学者可不勉哉……苏子瞻诗云，此生有味在三余，其意深矣……予质鲁恒，以不学为戒，故三冬甲夜，孜孜于退食之时，游情于圣贤之籍，是予之策其余力也，若云知味则未之逮。是为记。

由于“余而可味”包含着很深的哲理，所以顓琰特别喜欢“味余书室”这一命名，并常以此自勉，没有虚度这一段宝贵的时光。他的师傅朱珪后来为《味余书室全集》写了一个跋，实际上是对这位当年的学生作个基本评价：

臣自乾隆丙申（四十一年）夏五月入直尚书房，得侍讲案，……窥我皇上生知睿圣，好学敏求，诵读则过目不忘，勤孜则昕夕不怠，计日课诗，岁不下五百余首，各体咸备，义必正大，声中黄宫，不为雕篆矻掣之音，洞烛于中而发之以诚，须乎至仁之心，宜天佑之所笃，申万民之所托命也。文则执经心而镜史志，条理综贯内圣外王之学。

朱珪的这番评价，看来并非完全出于对皇帝的颂扬，通观《味余书室全集》所载诗文，确实不乏纵论古今、阐发经史的力作。事实上顓琰的思想、品质、性格、作风等等，基本上是在“味余书室”读书这段时间里形成的，这对于他的为人与为政关系甚大，其中又突出地体现在“勤”、“俭”、“仁”、“慎”这四个方面。

关于“勤”，顓琰不仅注意身体力行，而且对这一命题的议论也最多，其中的《民生在勤论》，写作时间较早，可以代表他关于“勤”的原始思想。文曰：





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，自天子以至庶民，咸知勤之为要，则庶政修而万事理矣……贵贱之等、内外之分虽有不同，而朝夕兢惕，各勉于勤，自能臻善而寡过也。人日习勤劳则日近于善矣，日习惰弛则日近于恶矣。如其不勤，则为学者安于下流而不能上达，为治者惰于事功而庶政怠荒，欲求家国治、天下平，其可得乎?!故勤者夫人所当勉者也。若农夫不勤则无食；桑妇不勤则无衣；士大夫不勤则无以保家；公卿不勤则无以佐治，其害奚胜言哉。书曰：惟日孜孜，可不戒与?!可不勉与?!

这些话并非顓琰关起门来空发议论，而是他日后勤政的思想基础。为学以勤，为政以勤，始终如一。在这方面，顓琰可说是当之无愧的。

关于“俭”，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，只能是相对的，而不可能是绝对的。但是否具有这种思想认识，情况就大不一样。顓琰对于乃父乾隆后期的肆意奢华，口里虽不好直说，但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。所以他经常借读经来大发议论，其中有一篇题为《礼与其奢也宁俭论》的文章道：

孔子曰：与其奢也宁俭者何哉？原乎礼制之始，有朴素之质，而后有周旋之文，不务浮华，专事节俭，此太古之风也……后世踵事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，竞奢靡之习，忘节俭之风，而礼之本意失矣……移风易俗、拨乱反正之道，莫善于俭也。为学为治者，岂可以是为常谈而忽之哉。

这位十五阿哥的确聪明得很，他首先把孔大圣大圣人请出来，即使乾隆看了也无话可说，然后借题发挥，抨击一番，亦属有理有节，不失分寸。所谓“节俭乃太古之风”，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，既是指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，也是指满族自己的开山鼻祖。至于所说的“后世踵事增华”指的是谁？这就请对号入座了。所以他在亲政后实行拨乱反正，把崇俭黜奢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关于“仁”，顓琰在习学时就说过：

博爱之谓仁，尚矣……圣人应天受命，调御万方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家国以治，天下以平，流泽子孙，其根本深厚于仁。

所谓在家为孝，在外为仁，两者本来就是紧密相联的，而顓琰确是两者兼而有之。顓琰之孝，早已为乾隆及老祖母孝圣宪皇太后所称许，这也是他得以嗣承大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至于顓琰之仁，这里暂不多说，拟结合他亲政后的具体情况再详加考察。

关于“慎”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广，顓琰曾有诗句提到：“图书率性参精密，默养心田慎满盈。”可见他从小就很注意对于“慎”的修养，诸如慎为政、慎用刑、慎择臣等等。就拿慎用刑来说，顓琰认为：

用刑之大旨，不外明慎。明者知其事之原委，察其情之真伪，两造既备，虚衷听断，如日之光，不遗幽暗，犯法者甘心认罪，受害者了无嗔怨，此明之功效也。慎者……一字无虚始可定案，片言不实勿厌重推。

顓琰在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实践经验，但他对于乾隆后期的情况还是注意观察的，他所讲的明与慎的相互关系，也是合乎道理的。事情往往是由慎而明，由明而断。这样，事情就有可能办得好一些，而历代种种冤假错案的出现，除居心不良、贪赃枉法者外，难道不正是既不明又不慎的结果吗?!所谓“情况不明决心大，心



中无数办法多”，表面上看好象很聪明、很有魄力，其实是愚蠢至极，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，其结果只能是把事情办坏。

总而言之，顓琰在这漫长的“味余书室”岁月里，学业与思想均已趋于成熟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孜孜以求、勤敏好学所致；另方面也与诸师的谆谆善诱，多方启迪分不开。顓琰自己说过：“予六岁入学，习经书，十三学诗，十七属文，书窗朝夕，行帐寒暑，幸无间断。若今体格，初从学于（谢）东墅师傅；古体诗及古文，从（朱）石君师傅习焉。予赋性鲁钝，赖二先生切磋琢磨之功，十有余年，略开茅塞……”于诸师中，最受顓琰敬重的，当首推朱珪。

朱珪，字石君，顓琰惯称他为石君先生。珪少时受经于大学士朱轼，“八岁即操觚为文，文体倔犟苍古”，年十九登进士，为乾隆所赏识，尝称：“朱珪不惟文好，品亦端方。”初出任地方官，“四十年，召入觐，改授侍讲学士，直上书房，侍仁宗学。”自此深受顓琰敬重。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朱珪奉命典试福建，临行赠顓琰五箴，“曰养心、曰敬身、曰勤业、曰虚己、曰致诚。仁宗力行之，后亲政，尝置左右。”可见朱珪对顓琰思想影响甚深。当时顓琰也赋诗送别。诗曰：

……

玉尺抡英奇，霏采辉南斗。
硕儒振士风，学艺焙醇厚。
行旌飭河染，驰赴琨瑶阜。
三载坐春风，半岁别云久。
心怀去路遥，目极天涯有。
雁落远浦沙，风送长亭柳。

……

送君歌骊驹，离情情谁剖。

次年，朱珪又奉命总督福建学政，因这次不是临时差使，所以顓琰的离情别绪显得更深厚、更强烈，撰成长律六章，与师志别。现择录其中三章如下：

衡文三载例推迁，一纸纶音下九天。
何幸仕林瞻宿彦，由来才望属名贤。
满堂桃李声华灿，奕世经书清白传。
又拥轺车向闽越，甘棠遗荫喜重联。
欲去难留可若何，片言相赠耐吟哦。
仙霞秋色迎天节，须女文光烛晓河。
别意时萦雁过处，离情空见月明多。
人生聚会原无定，且为斯须驻玉珂。
屈指流光五载期，就将启导荷贤师。
授经评史真探奥，作赋论文匪好奇。
秋月春风时对话，细旂广厦每凝思。
中心切切勤攀恋，渺渺离悰话讲帷。

此后，这类赠诗更是越来越多，有祝贺石君师升迁调职的，有祝贺大寿的，也有以诗代书遥寄问候的。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是年既是乾隆八旬大寿，又是朱珪花甲之年。顓琰不顾避讳，竟情不自禁地在贺诗中把父皇和师傅联在一



起。诗曰：

圣主八旬岁，鸿儒花甲年。
三天德夙著，五福寿为先。
律转浹辰纪，辛占二百前。
芝颜驻丹景，艮背贯渊泉。
鹤下瀛洲树，花摇海岳烟。
千春桃结实，十丈藕成船。
论道心追洛，传家族茂燕。
吏铨资重任，台鼎待名贤。
文笔超韩柳，诗才贯道禅。
早锤爪趺盛，不使葛藤牵，
设醴诚难罄，尊师敬独尊。
期颐长颂祷，如阜更如川。

如果说，“文笔超韩柳”之句有点过誉，那么，“尊师敬独尊”则反映了顓琰内心真实的感情。其后顓琰嗣位，朱珪正在两广总督任上，“高宗欲召为大学士，和珅忌其进用，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，指为市恩。高宗大怒，赖董诰谏免，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，屏不得内召。”可见顓琰与朱珪之间的诗句实在非同一般，揽权窃政的和珅，早就把它盯上了。而顓琰与朱珪不寻常的关系，就是在“味余书室”期间奠定的，顓琰嗣承大位的优势，实际上也是在“味余书室”期间奠定的。

前面已经提到，顓琰出世时还剩下六位哥哥。随后，他的生母魏佳氏又生下两子。皇十六子四岁夭折，皇十七子永璘则是最后一名小弟弟了。按此计算，顓琰在这八兄弟的排列中，排行倒数第二。这样，顓琰能否嗣位，确是玄而又玄。

但既然是皇子，就总有嗣位的希望，不过要把希望变成现实，还得半靠机遇，半靠自我奋斗。

顓琰的奋斗并不象乃祖雍正。他不要权谋，不靠残酷的争夺，而是靠自己的品行、德性和学识，在自然的静态中，慢慢地赢得了父皇乾隆的赏识。此外还得靠更多的机遇，而这种机遇，顓琰也是有的。

在无嫡无长的情况下，乾隆到底属意谁呢？此人不是当时叙齿居长的四阿哥永璂，也不是日后得以嗣位的顓琰，而是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的五阿哥永琪。关于这一点，乾隆在一次有关建储问题的回顾中提到：



……以皇次子乃孝贤皇后所生嫡子，为人端重醇良，依皇考例密箴其名，定为皇储，是未尝不欲立嫡也，但不以明告众耳。嗣后皇七子亦孝贤皇后所出，秉质纯粹，深惬朕心，惜不久亦即悼殇。其时朕观视皇五子于诸子中觉贵重，且汉文、满洲、蒙古语、马步射及算法等事，并皆娴习，颇属意于彼，而未明言，乃复因病旋逝。设依书生之见，规仿古制，继建元良，则朕三十余年之内，国储凡三易，尚复成何事体。

这位曾为乾隆属意的五阿哥永琪，生于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二月，因“少习骑射，娴国语，上钟爱之”。三十年十一月病重时，被封为荣亲王。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三月去世，卒年二十六岁，谥曰“纯”。永琪的去世，对顓琰来说，实质是又一次机遇，尽管他自己在当时无此意识。同时，永琪之被属意，也说明了一



个问题，就是乾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，不再论资排辈，而是转向了立贤，这不能不说是顥琰在其后得以嗣位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

现在再来看看顥琰另外几位兄长的情况。六阿哥永瑤，早在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十二月便奉父皇命出继慎郡王允禧为嗣。允禧是康熙的二十一子，多才多艺，“诗清秀，尤工画，远希董源，近接文征明，自署紫琼道人。乾隆二十三年五月薨。”而永瑤本人也是多才多艺，“亦工画，济美紫琼，兼通天算。”他初封贝勒，三十七年晋封质郡王，五十四年再进质亲王，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去世，卒年四十八岁。

四阿哥永城，则是在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出继给履亲王允禔为嗣的。允禔是康熙的十二子，掌管过正白旗满、蒙、汉军三旗事，势力颇盛。雍正即位后封履郡王。乾隆初年晋封履亲王。卒于乾隆二十八年，其子弘昆先此去世，遂以永城出继。

这样一来，有希望嗣位的只剩下八阿哥永璇、十一阿哥永理、十二阿哥永璘、顥琰和他的亲弟弟永璘了。

关于永璘的情况，在上节已有所论及。他学习很努力，一生没有犯过什么过错，只是由于他是废后纳喇氏之子，乾隆对永璘毫无好感，到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病死，既无封号，也不赐谥。不过顥琰还好，他不象乃祖雍正对兄弟辈那般残酷。他对于每一位兄弟，不管是去世的还是活着的，都有着很深的手足之情。乾隆五十年，当他路过这位可怜的十二阿哥的四阿哥陵墓时，感触甚深，特赋诗一首。诗曰：

远别人天已十年，夜台终古锁寒烟。

一生心血凭谁付，手泽长留在断篇。

（十二兄手抄清语一本八千余句，乃生前日日展玩之书，今在予处敬谨收藏。）

风雨书窗忆旧情，还思听雨续三生。

弟兄十七萧疏甚，忍见长天雁阵横。

（予弟兄十七人，今存五人矣！）

这些诗句，既表达了顥琰对十二阿哥的哀思，同时也对他众多兄长的早逝，表现出无限的怀念。

八阿哥永璇，虽说在乾隆四十四年已受封为仪郡王，但在五十四年却没有和其他弟兄那样获封亲王，这就证明乾隆对这位皇八子的看法不好。他的亲弟弟、十一阿哥永理，本来很有才气，“善书法，幼时握笔，即波磔成文，少年工赵文敏，谈论书法具备，名重一时。士大夫得片纸只字，重若珍宝。”“高宗爱之，每幸其府第”。可是这位颇为自负的永理，却在乾隆三十一年因在顥琰的扇子上题署“兄龙泉”别号一事受到了父皇的严厉训斥。顥琰虽然与此事有一定的关联，但当时他年仅七岁，且雅号非他所署，所以乾隆并没有责怪他。乾隆的怒火，显然是冲着十一阿哥永理来的，但当时他也只有十五岁，有了这番训斥，永理要嗣承大位，已是不大可能的事了。

由此看来，顥琰的得以嗣位，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外，其外部条件，特别是诸兄弟情况的变化，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也是太富传奇性了。顥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（癸巳，1773年）被秘密箴名、内定为储君的，当年他只有十四岁。直到乾隆六十年





(乙卯, 1795年)九月,才被公开宣布册立为皇太子,而这时的颙琰已是三十六岁。这段令人寻味而又捉摸不定的时间,也实在是够长的了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年)九月初三日,乾隆帝御临勤政殿,召皇子、皇孙、王公大臣等人见,宣示恩命,正式册立皇十五子、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。定于明年(1796年)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,禅位于颙琰,改元为嘉庆元年。为此,乾隆发布了一篇很长的上谕:

……朕缙绍鸿业,六十年间,景运庞洪,版图式廓,十全纪绩,五代同堂,积庆骈蕃,实为史册所罕见……朕钦承家法,践祚后亦何尝不欲立嫡……不意其早年无禄,不能承受……嗣于癸巳年冬至,南郊大祀,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,禱于上帝……是朕虽不明立储嗣,而于宗庙大计,实早为筹定,特不效前代之务虚文之而貽后患耳……朕诞膺大宝,今六十年矣,迴念践祚时默禱上帝之语,并追忆朕年五旬后曾于圣母皇太后前奏及归政之事,彼时蒙圣母淳谕,以朕躬膺付托之重,天下臣民所系望,即至六十年亦不当传位自逸。次晨,朕即以圣母所谕,默奏上帝,若能长奉慈宁,寿跻颐庆,朕亦何敢复执前愿。乃自丁酉年以来,所愿既虚,于是仍冀得符初志,兹天恩申锡,竟获周甲纪元,寿跻八旬开五,精神康健,不至倦勤,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、外藩属国,实皆不愿朕即归政。但天听维聪,朕志先定,难以勉顺群情,兹以十月朔日颁朔,用是諏吉,于九月初三吉日,御门理事,召皇子、皇孙、王公大臣等,将癸巳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,公同阅看,立皇十五子、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,用昭付托。定制孟冬朔颁发时宪书,其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……其应行典礼,该衙门查照定例具奏。

从这一上谕可以看出,乾隆一方面为自己六十年来业绩欣然自得,又为储君的最后落实兴高采烈。他还赋诗一首志庆。诗曰:

归政丙辰天佑荷,改元嘉庆宪书观。

祖孙两世百廿纪,绳继千秋比似难。

弗事虚名收实益,唯循家法肃朝端。

古今悖史诚希见,愧以为欣敬染翰。

随着储君的公布,乾隆算是了却一桩心愿;而作为皇储、并即将嗣位的颙琰,此时此刻的心情却是复杂的。他对此既有点预感,又确实有点意外,其表现是既惊惧,又欣喜。如果说,颙琰对于自己的嗣位完全没有一定预感,那是不真实的。他在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随父东巡恭谒祖陵时所写下的诗句,其中大部分都是以“守成”为主题的。如在抚顺城写下了:“守成继圣王,功德瞻巍峨,永怀肇造艰,克勤戒弛惰。”在启辟往盛京时,写下:“尝祭思开创,时巡念守成,待瞻幽洛地,大业缅经营。”恭谒福陵时,又写下:“展礼珠丘思不匮,守成常念拓基难”。所谓“诗以言志”、“言为心声”,“继圣王”、“缅经营”这类话,并不是颙琰一时心血来潮讲出来的,而是表明了他对于日后“守成继业”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。事实也证明,他在亲政之后就是以“守成继业”作为指导思想的。尽管如此,当乾隆宣布恩命时,颙琰还是显得有些出乎意外,诚惶诚恐,既惊且喜。当时他写下一首诗说:



天光下贯到臣身，秩晋青宫恩命申。
一己愚哀频战栗，千秋金鉴凛遵循。
谦恭作则钦先训，胞与为怀体圣仁。
自愧凡材何以报，趋庭听夕侍君亲。

稍后，他去谒陵时又写了一首：

孙臣蒙宠渥，致敬告珠丘。
自念微才薄，难承锡命优。
孝思诚不匮，子职务勤修。
虔祝皇躬健，频增海屋筹。

另外，他在《十全纪实颂》里还提到：“…立臣为皇太子，闻命之下，五内战兢，恳陈孺私，未蒙俞允……这些话，虽然多少带有些自谦的成分，但无可否认，顒琰对于自己的嗣位思想准备是不足的，因而在内心的确存在着某种不安。嘉庆二年，他在回忆过去的味余书室生活时所写下的诗句，更清楚地反映了他在嗣位前的真实思想：

室本旧时额，味余意可寻。
经书堪乐性，吟射自娱心。
欲了此身事，何期宝命临。
从兹鲜暇暇，承旨寸衷钦。

不管顒琰是否真的准备在“味余书室”中“了此身事”，他毕竟已是从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，静悄悄地成了乾隆内定的储君；又从内定储君成为公开的皇太子，成为即将受禅嗣位的嘉庆帝。然而这位年龄已不算太轻的嗣皇帝，所肩负的并不是什么“宝命”，而是一付十分沉重的历史重担。对于这一点，聪明的顒琰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。



第二章 恭聆圣训

自嘉庆元年（丙辰，1798年）正月元旦颙琰嗣位，到嘉庆四年（己未，1799年）正月初三乾隆帝病逝，在这三年零三天的时间里，乾隆帝作为太上皇，仍然总揽大权。而颙琰，与其说是登临宝座的嗣皇帝，不如说是一个整天恭聆圣训、侍游侍宴的侍皇帝。这段时间，既是嘉庆新朝的开端，也是乾隆帝晚年政治的延续。这三年，实际上是颙琰隐忍不发的三年，这对于一个准备锐意革新政治的新皇帝来说，既是痛苦的，又是可悲的；但对于他进一步体察朝政，积累经验，又是有益的和必要的。

一

嘉庆元年正月元旦，这是一个大喜大庆的日子。与过去众多的皇帝登基的情况不同，颙琰不是在先帝大丧期间即帝位的，所以用不着一面办理丧仪，一面筹备庆典，因而朝内朝外，上上下下一片喜气洋洋，从早到晚，鼓乐之声不断。这一天，寿高八十有六的乾隆，在就位六十年后成为太上皇；而三十七岁的颙琰，在被内定为储君二十三年后，当上了嗣皇帝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喜上加喜。

授受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，仪式十分隆重而又十分热烈。是日，颙琰先侍乾隆帝诣奉先殿行礼、诣堂子行礼，遣官祭太庙后殿，仪典随即开始。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前檐下，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，导迎乐于午门外。太和殿东楹案上置传位诏书，两楹案上陈传位贺表，由大学士、内阁学士诣乾清宫请出“皇帝之宝”，置御案左几上。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朝服咸集，朝鲜、安南、暹罗、廓尔喀等国使臣列于班末。中和韶乐大作，奏元平之章，太上皇帝便在护内大臣等簇拥下，御太和殿升座。阶下净鞭三响，丹陛大乐作，奏庆平之章。礼部堂官迎导颙琰诣殿中拜位后，颙琰率王公以下大臣齐齐跪下，由大学士两人跪展贺表，宣读后仍奉安案上。再由大学士二人迎导颙琰至太上皇御座前，由左侧的大学士奉“皇帝之宝”跪进太上皇帝，太上皇帝将御宝亲手授给颙琰，再由右侧的大学士跪接后奉安于御座的右几上。颙琰率王以下大臣向太上皇行九叩礼谢恩，礼成，鸣鞭如前，中和韶乐作，奏和平之章。在这一片乐声中，太上皇帝欣然还宫，整个授受大典便告完成。从这里开始，就该把颙琰称作嘉庆帝了。

嘉庆帝在保和殿暖阁更换礼服后，复御太和殿登极，礼乐如前，由王公以下大臣暨外藩使节向新皇帝行九叩礼。礼毕，嘉庆帝还宫。内阁学士奉宝恭送回乾清宫。礼部、鸿胪寺官则诣天安门城楼上宣读太上皇帝的传位诏书。诏书很长，兹节录如下：

朕缙绍丕基，抚綏函夏，勤求治理，日有孜孜，仰赖上天眷佑，列圣

